

在我的朋友圈里,俞挺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心气甚高,当然不是虚张声势的那种,而是言之有物学养丰厚的那种。但还是傲,外人看着讨厌的傲。

我和俞挺认识多年,开始他是我采访的对象——本铜版纸杂志约我专访他,彼时的他,皮衣皮裤——多年之后我常调侃道:伊嵒辰光,依和汪峰的区别就是少一条皮带上的大链子。

当然,头发也还算茂密。初识之后的很多年,我们淡淡地交往着,在微信被发明之前的岁月里,一度失联。直到几年前他写了一本关于上海的书。作为朋友圈里公认的上海原教旨主义者,我和他再度聚首,并且,我写了一篇书评,里边一句话瞬间击倒了这个傲气的中年男人,我写道:(俞挺)经常有意无意放大自己其实人畜无害的攻击性。

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最后那句台词说的,一段美好的友谊开始了。

近期,这个再也与皮衣皮裤无缘的男人,在上海之巅——上

海中心的朵云书店发布了他的新书《上海小吃指南》。他外在的攻击性近年收敛了大半,但是阴面的傲气,还是充溢在日人设——也是他的宿命。没了这点特质,俞老师应该会非常乏味。

孤岛的生活是可耻的

费里尼

在这本被设计成三小本本的书里,他核心扮演了这个角色——一名来自1970年代,市井小吃深情款款的追忆者兼入殓师、本城孜孜不倦的民间代言人、视妻女和家人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好男人、感喟青春已逝但还是努力“扶我起来试试”的伏枥老骥。

痴长一岁的我,感同身受。在这个城市已经日益不以我们的意志作为转移,撒着欢子奔向今天的今天,我们有责任用我们不可替代的记忆和文字,为未来人类做人文学考古时,留下一点草蛇灰线。正史不屑修、不值得修的东西,私家记忆来补。

我真的看完了《上海小吃指南》。那么,这真的只是一本有关

美食黄页的书么?智者见智,黄者见黄。按图索骥,自然可以大快朵颐。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俞挺夹杂在黄页信息缝隙里的情绪侧漏。“咖喱煎包看上去朴实的外表下面隐藏的咖喱味道像极了恶作

剧,我们吃了它,仿佛平庸的生活会因为做了一些小罪恶的事而精神百倍;说吃肉馒头——“年轻人常说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幸运的。身处黄金时代。我们的确需要感恩。但我们当时真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妙不可言的年代。”批判龙虾泡饭的徒劳——“用豪华来包裹心酸艰苦的回忆,似乎为了证明苦尽甘来,但最后在口腔里各奔东西的汤和饭,说明了他们不是一家人”。

还有,那个上世纪90年代清华校园里,能吃一斤汤团但是被北京一斤元宵击倒的宁波同学的故事也很有趣。对一本书,各人有各人的阅



读方法。对这本,我的建议,先是按照黄页的办法,想吃什么,翻到哪儿,按俞挺指点去尝试一下。再有闲,找黄页之外的文字品读一下,那里有一个深爱这座城市的男人的口腹成长史的鳞爪,他的记忆、判断。或许纯个人,但是关于时代的共鸣是相通的。我常说,一个写纪实类文字的作者的最佳年龄其实最好从50岁开始——一个再混蛋、混沌、混账的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摔打,也会变得悲天悯人起来。那谁不是说了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孤岛的人是可耻的”是印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在时代的汪洋中,每个人都变成了孤岛。如今的人类已经不需要猎食,甚至不需要离开屋子出去觅食,人类的啮齿特征除了在某些综艺明星身上依旧突出之外,大部分已然日渐平和。我们每天都在退缩,从大陆分离出孤岛,就那么孤零零杵着。

小吃指南就是人间指南。如果一个人连吃的劲头都没了,盘桓人间的意义又在哪里?



云涛不语 月浪无声 铜刻 陆康 书 梦臣 刻

近日,为筹拍电视纪录片《黑胶唱片》,我又走访了中国轻音乐之父——96岁高龄的郑德仁先生。

我与郑老是相熟三十多年的忘年交,曾一同组织过系列音乐会《海上寻梦》。眼下,他年事已高,早不参与音乐和社会活动。我的到访,开启了他尘封多年的旧时记忆。

那天,因电视拍摄之需,在他家翻阅与主题有关或能见证时代印记的物件。其中一些早期的轻音乐黑胶唱片和两份最早的上海轻音乐团演出节目单,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出于职业敏感,旋即就向郑

老刨根问底。有了定论,在几经选择后确定:以老锦江饭店对马路的原法国俱乐部作为舞场,每周六、日晚举办二场舞会。起初的伴奏是

上海最早的轻音乐团

李定国

的文娱生活,上海的外事部门安排了中外经典电影的放映;观摩聆听戏曲、音乐会专场演出及组织文艺联欢活动等等。负责外事接待的杜宣请示有关领导,陈毅市长指示:特事特办,服务好外国专家,以利他们的工作,是外办的重要职责。

播放录音,但效果远不如乐队伴奏。参加舞会的专家们也不甚满意。于是,杜宣就请上海音协负责日常工作的夏白帮忙组建伴舞乐队。夏白想到能组建此类乐队的第一人,就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低音提琴郑德仁。因为郑先生早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时,早就养家糊口而勤工俭学,为养家糊口而勤工俭学,并一直参与百乐门舞厅乐队的谱曲配器和演奏工作。



上海的垃圾分类刚开始全民教育培训时,网络上曾经很欢乐,可是我对那些流行段子一点儿也笑不出来,反而觉得很羞惭。不是我矫情,对于垃圾分类的觉悟,实在是我在国外生活阶段被反复教育的结果,我曾经是个漠视垃圾分类的后进分子。

1990年我刚去日本,租住在东京中野区,入住的时候房东关照了一些规矩,包括垃圾分类。我没有听懂,更没有料到垃圾分类并不是我想象的,将可回收的瓶瓶罐罐拿出来就可以了。我记不得每周几是丢厨余垃圾,每周几是丢可回收垃圾,每周几是丢大件垃圾,马马虎虎用超市马马虎虎将垃圾塞入一扎,出门时顺势丢掉,可是居民楼下街道上并没有垃圾筒,搞不懂究竟该丢在哪里。

后来才知道收垃圾车不仅有星期几来,还有几点钟到的规定,不到钟点,日本人把垃圾藏在自己屋子里,不会拿出来扔街上在光天化日下打扰邻居,给别人添麻烦。常常是半夜打工回到家,我偷偷扔在门口、角落的垃圾不知被谁帮着拿走了。后来知道集中点了,明明是丢可回收垃圾的日子,我把不可回收的扔在那里,回家路上就看到两只很明显我的袋子刺眼地留在地上没有被收走,犹豫拿回还是不要,匆匆逃回家。

那时候,中国留学生中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大家借口读书打工

压力太大,哪有空去像日本妇女那样,吃一只酸奶也要将垃圾分三类,可降解不可降解太难懂了,烦也烦死了呢。有一次我两个哥哥要扔一台坏冰箱,日语叫粗大垃圾,这种垃圾,每个月才收一次,还要电话预约,谁有那么多空啊!我哥抬下楼去平时收集垃圾的空地,刚一放下,就有个日本人出来干涉,不允许放在那里。我哥想这里不行换地方,就装上自行车往前

用点心,成自然

孔明珠

推,见四处无人又在路边放下。那个老人不知从哪里又钻出来,大声呵斥他们,只好再装车往前推,就这样从黄昏走到天黑,只要我哥一回头,准见老人家不紧不慢跟着走。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只能加快脚步飞奔,看到路边一家汽车间门开着,堆满旧东西,灵机一动卸下坏冰箱旋即溜走了。

等到我们日语渐渐好起来,接受得了媒体信息后,才渐渐醒悟入乡必须随俗,改变陋习文明融入。搬到新住处后与房东交谈,认真真听懂并真正理解了日本人为何那么重视垃圾分类。

近十多年来,我陆续在美国短住,扔垃圾也同样规矩很多,分类是必须的。如果是住独栋房子,每家都买三个一人高的大垃圾桶,黑

色的装厨余等湿垃圾,灰色的装可回收干垃圾,绿色的装杂草树叶泥土等自然垃圾。女儿家街区每周三是车垃圾的日子,隔天晚上四邻都把有轮子的垃圾桶推到家门口的马路边上等着。即使是老人残疾人,垃圾桶也必须自己推出来,因为第二天轰隆隆开来的大垃圾车是由机器手夹垃圾桶起来倾倒的,司机不会下车帮你整理,如果你的筒装太满盖子开着,很有可能就只能留到下周了。美国法律那么严格,犯法成本极高,谁不乖乖听话你就等着吃罚单吧。

因为受过多年教育养成好习惯,我很接受上海垃圾分类的规定,除了倒湿垃圾必须除袋弄脏手有点啧言之外。我家公寓楼下一排大垃圾桶整天可丢垃圾,有一位清洁工负责整理。前几天在别的区一小区口等车,看见黑墙上曝光某号几零几姓甚名谁乱丢垃圾的字样,门卫说,他们都是过了垃圾房开放时间,黑夜里偷偷堆放,由电子探头抓住的居民。我惊叫道,电子探头那么厉害识别人脸啊,门卫悠悠地说,居委会主任的眼睛可不是吃素的。我说,那样曝光人家隐私不大好,以后改变方式吧,垃圾分类本身是件文明进步的事呢。

十日谈

“垃圾分类”新风尚

责编:杨晓晖

明日请看《观念产生效率》。



上海早年的民宅,大致上分为弄、里、坊、邨、楼五大类型。弄和里应该算是最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它们构成上海最广泛的住宅架构,叫做里弄。坊和邨,上了层次,有独用的煤卫设施,是过去时代的花园小区。楼的档次应该还要更高一点。以上是作家马尚龙告诉我的,他还特别强调了“邨”。邨是村的繁体字,现在已经通用于“村”,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两个字没有区别,但是在上海住宅的意义上,邨是肯定不愿意混同于村的。

“邨”里有佳人。一代红星阮玲玉就住在沁园邨里,这是她人生最后的住所。沁园邨位于新闻路1124弄,东临昌化路,西靠江宁路,建于1932年,占地0.7公顷,有楼房56幢,呈“非”字形结构排列,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沁园邨的主弄和支弄都十分宽敞。邨内住宅主体为砖混结构,高三层,楼上都带有挑空阳台,楼下小庭院,砖式水泥围墙,上部镂空,视觉空间很舒适,后门采用十分人性化的内回式拱券设计。1933年至1935年期间,阮玲玉住在沁园邨的9号。这栋小楼是坡屋顶,外观以拉毛水泥饰面,转角处做不规则装饰,细部略具装饰艺术派特征。

如今挂牌为阮玲玉旧居的沁园邨9号,是当年上海的茶叶大王唐季珊用10根金条为佳人购入的,一楼是阮玲玉接待朋友的客厅,二楼则是她和唐季珊的卧室,三楼是阮玲玉母亲和佣人的居所。可惜爱巢共建仅几年,1935年3月8日凌晨两点,阮玲玉在其二楼卧室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留下一纸“人言可畏”的遗书。鲁迅先生得知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后,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咨嗟惋惜。

很多人面对俗世的纷扰,大多数应对的方式是想方设法地去织一张网,或许是血缘关系,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紧紧抓住你的肩膀,把你牢牢按住。可惜,阮玲玉自杀时显然没有一只按住她肩膀的有力手。其实很多人是被一张世俗的网踏踏实实按在了生活里,反之,他们也很努力地经营这张网,在一切外力和内力使自己动荡的时刻,将自己牢牢地网在原地。

在阮玲玉同时代的好莱坞,葛丽泰·嘉宝是最著名的女星。1926年,阮玲玉出演了自己的首部影片《挂名夫妻》,从而开启演艺生涯。同样在1926年,嘉宝拍摄了她在好莱坞的第一部影片《激流》。“请让我一个人呆着”,这是嘉宝在1932年其主演的电影《大饭店》里一句很有名的对白。据说《牛津名言词典》里不但收了这句话,还加上了注释,说嘉宝生平最爱说这句话。电影《大饭店》挪用了嘉宝的这句口头禅。与阮玲玉不同,面对“人言可畏”的好莱坞,嘉宝的选择是毅然而然地扭头离开。二战后,嘉宝在纽约市区买了套有着7间房的公寓,独自一人生活。离开了猎艳的电影圈,享受宁静人生的嘉宝留给人们一个惊艳的背影。

因为郑德仁的能力和影响,新组建的乐队很快便聚拢了三四十名各司其职的乐手。诚然,伴舞的乐队只要十来位乐手即可,而且以打击乐和铜管乐为主。如今一下招募到这么多有水准的乐手,而且声部齐全,郑德仁就向夏白建议:何不组建一支轻音乐团,既可伴舞,还能专门排练一批轻音乐作品,一举两得。

夏白也很赞同,在得到上级批准后,1956年秋,上海音乐家协会旗下的上海轻音乐团正式成立,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尚属首次。郑德仁任团长兼指挥。乐团除了排练大批伴舞的界外名曲外,还陆续积累了一批中国作曲家新创的轻音乐作品:其中有李伟才的《欢乐》,商易的《新春圆舞曲》,郑德仁的《江南好风光》,徐德义的《晚会圆舞曲》及阿克俭重新编配的《彩云追月》和《花好月圆》等。

1956年底,上海轻音乐团首次亮相。在兰心大戏院推出一台中外名曲音

乐会,轰动上海,5场演出门票一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每场演出前,等票者是人头攒动,可见轻松愉悦又通俗易懂的音乐,是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

打那后,这支乐团除了正常伴舞外,还经常下基层为工农兵服务。许多上海乐坛的名家:司徒海城、吴大昭、林明珍、戚长伟、张应娴等纷纷随团演出。1958年2月,在人民大舞台的公演,是上海轻音乐团的最后一次演出。



千朵万朵压枝低 (水彩) 金立德